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研究

——以数字出版为视角

摘　要：我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在全球化、现代化及经济一体化的挤压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保护和传承的重大挑战。而信息化时代，数字出版等数字传播技术的成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突破了传统传承方式的局限，以显著的传播优势满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传播创新的需要，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化时代的保护、传承与知识转化，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新模式。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数字出版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34（2017）12-086-05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17.03.016

■文 / 蔡梦虹

信息化时代，数字技术凭借其显著的传播优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方面的价值，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与重视。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与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在信息时代，如何用信息技术保护中华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之根，是时代赋予国人的责任和使命。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概述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2003 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问题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保持和弘扬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达国家“强势文化”的入侵和冲击，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威胁甚至面临着生存危机。此外，在同一个国家中，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面临着文化认同危机，因“后继无人”而濒临危境，逐渐消亡。当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积极探索如何采用有效手段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困境，开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文明中的生存空间，从而增强其生命力、活力及可持续发展力。在此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应运而生，

数字化传播是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出现的以电脑为主体、以多媒体为辅助手段的新型信息传播活动。数字化传播把各种数据和文字、图示、动画、音乐、语言、图像、电影和视频信息组合在电脑上，并以此为互动，是集合了语言、文字、声像等特点的新的传播途径，能提供多种网络传播方式来处理包括捕捉、操作、编辑、贮存、交换、放映、打印等多种功能。将数字化传播技术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以数字化手段和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化和情境化，创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传播手段，不仅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存和保护，更能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得到更好的开发、传播和传承。

2.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1 应对西方文化入侵的需要

随着当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以及在经济全球化的影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4 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工夫茶的文化旅游形象塑造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GD14XXW01）、潮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5 年度一般项目“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侨乡非遗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以潮州工夫茶文化品牌形象传播为例”（项目编号：2015-A-18）的阶段性成果。

响下，文化全球化成为必然趋势。

日本学者星野昭吉教授认为，文化全球化就是经济强势国家的价值体系在世界范围不同价值体系中的扩展，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一体化，文化全球化就是弱势国家的文化被强势国家的文化同质化与一体化的过程。[2]

一方面，西方国家以向世界输出西方价值观为目的，通过大力开发自己的文化创意产业，强势向发展中国家倾销西方价值体系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凭借自身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不断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资源，特别是散布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使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的文化安全问题，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途径迫在眉睫。

从本质上来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强势文化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和扩张，其背后隐藏的目的是在于通过自身文化产品的全球扩张，达到自身文化价值体系的全球化培育，从而实现其文化的全球化认同，进而达到其经济扩张、政治同化的隐形目的。[3] 而数字化传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应对发达国家文化入侵的有效手段。

2.2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形”传播的需要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了阐述，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是“诠释、展示、传播和传承”。对“非遗”进行诠释、展示、传播与传承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传统的物理方式和新兴的数字化方式。

传统的物理性方式主要以博物馆、“非遗”景观、民族手工艺品等实物为传播载体。然而，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传统物理方式的传承遭遇不小的现实困境。譬如，传统的以博物馆为载体的展出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传统文化深入研究和鉴赏的需要；大规模的文化遗产传统保护研究工作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凭借其在保存和传播方面的巨大优势，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探索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的新途径，成为各国政府、学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2.3 我国“非遗”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非遗”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现实困境。其一，我国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年轻人一般外出打工，较少人愿意从事这项传统的工作，目前现有的传承人大部分年事已高，且又后继乏人，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其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落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缺乏创新的手段，大部分重要的资料只能依托泛黄的纸质文本、图片等形式陈列在档案馆、博物馆中，这种方法对非物质遗产仅是一种基本的保存，并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以及传播推广，更无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巨大的文化、经济和社会价值真正体现出来；其三，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经费主要依赖中央和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但我国的“非遗”项目种类繁多，仅依靠政府的财政经费展开保护工作并非可持续发展之道。如何用创新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命力，使其不失传统而又能实现创新性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务之急。

在现代高度发展的经济社会中，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应该把握住时代脉搏，充分利用好市场这个传播环境，用经济生命力激发文化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巨大的文化和经济价值，通过合理和有效的开发利用，既能利用文化资源创造文化资本，又能利用文化资本增强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这种方式对于遗产地，特别是经济欠发达遗产地而言，是文化和经济协同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拥有五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国人对传统文化有着解不开的情结，且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们对于物质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两者的作用力下，蕴含传统文化内涵、特色、精神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市场上颇受人们的青睐。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发展，带来了契机。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利用，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模式，一方面能促进其在数字化时代的广泛传播，满足“非遗”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能促进遗产地文化和经济的协同发展，并通过促进遗产地的经济繁荣，留住人才参与“非遗”传承，解决传承后继乏人的难题，形成遗产地文化和经济相互促进、协同创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手段——以数字出版为例

3.1 数字出版传播形态的产生和发展

数字技术应用于出版业务中，对出版传播的发展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特别是数字化出版产品的出现，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出版形态的诞生。数字出版形态的发展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步，历经了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发展阶段。

电子出版（Electronic Publishing）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图、文、声、像等信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磁、光、电介质上，信息通过计算机或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读取使用的一种出版形式。电子出版是基于计算机排版系统的诞生及桌面出版技术的应用而出现的。与传统的纸质媒介出版物相比，电子出版物呈现出数字化、多媒体化、交互性、超文本化等特点。网络出版（Internet Publishing），又称互联网出版，是指具有合法出版资格的出版机构，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流通渠道，出版并销售数字出版物的行为。网络出版具有主体合法化、产品数字化、流通网络化、交易电子化等特点。手机出版（Mobile Publishing）是指手机出版服务提供者使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表现形态，将自己创作或他人创作的作品经过选择和编辑加工制作成数字化出版物，通过无线网络、有线互联网络或内嵌在手机载体上，供用户利用手机或类似的移动终端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传播行为。手机出版具有

便捷性、交互性、多媒体性、高容量、个性化和受众信息准确等特点。

3.2 数字出版传播特征分析

数字出版传播主体特征。在传统的出版传播模式中，作者、出版者、媒介商等个人或机构是传播的主体，对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等具有一定的掌控权。在数字化环境下，传播主体的组织结构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传播受众也拥有了话语权，迎来了自助出版时代。

数字出版传播媒介特征。与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不同，网络与新媒体使数字出版的传播工具发生了巨大改变。以电子书为代表的电子阅读器、智能移动网络、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手持终端阅读、网络阅读和手机阅读成为数字出版时代的三大新型阅读方式。电子阅读器、智能手机等数字阅读工具，以其便携式、实时化、大容量等优势成为数字化时代不可或缺的典型阅读工具。

数字出版传播内容特征。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出版传播内容呈现出多媒体性、精简化、碎片化等特征。一方面，传统的纸质出版物主要基于静态的文字和图片两大传播符号，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时代的出版物在内容和思想的表现形式上有了巨大的突破。数字传播在原有静态的文字和图片传播形式的基础上，还有动态的音频、视频、动画等多媒体表现形式，更有阅览者实时参与交互等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为了迎合人们零散化和碎片化的休闲时间，数字出版内容呈现出“快、新、浅”等特征。在“浅阅读”时代，为适应受众在零碎时间里的快速式、兴趣化阅读需求，数字出版传播内容呈现出精简化、碎片化的特点，以满足受众“大量信息简单摄入”的需要。与传统“精、专、深”的出版内容不同，数字出版内容“快、新、浅”的要求使得微小说、微电影、微动漫、手机报等出版形式倍受青睐。

3.3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出版传播模式

数字出版传承就是运用数字技术，全方位、真实地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多形式数字资源存储，实现数字化的传播。[4]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出版传承可以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学校“非遗”教育、“非遗”资源数据库等渠道进行传播，以达到“非遗”开发、教育、宣传及研究的目的。

其一，文化创意产业的传承。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企业、市场的纽带，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开发。通过促进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前提下的经济行为，反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成良性循环。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包括广播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与设计、雕塑、环境艺术等方面的创意群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与数字媒体技术有机结合，积极开发有浓郁文化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是数字化是时代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途径之一。可以通过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充分剖析、挖掘其中的时代价值，开发出富有中国特色、民族精神的数字文化产品，包括数字影视、数字动画、数字工艺、数字游戏等；并通过数字出版，利用光盘、移动阅读终端、计算机网络等播放平台，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发展产业。

其二，学校“非遗”教育的传承。学生是祖国文化事业的接班人，是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力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具有民族特色鲜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等特征，但当代部分青少年对本民族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理解并不深刻，部分人甚至缺乏民族文化认同感，这使得“非遗”教育的展开刻不容缓。通过文化出版，将“非遗”文化产品引入课堂，是展开学校“非遗”教育的有效手段之一。

其三，“非遗”资源数据库的传承。利用多媒体虚拟现实技术，建立包括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动画等在内多媒体数据资源库，全方位地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最大的特征是“非物质”的属性，是以人为依托，以声音、形象、技艺、经验、精神为主要表现手段，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这些特点决定了用数字化手段来记载和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用以记录和储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硬件、软件、技术等条件日趋成熟，可以借鉴大数据储存的技术和成果来储存大体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内容，为“非遗”资源数据库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资源数据库建设中，应该重点从检索功能、展示功能、交互功能、个性化功能等方面着手，打造基于“用户体验”的“非遗”资源数据库。在检索功能方面，优化关键词检索、分类检索以及跨数据库检索等功能；展示功能方面，基于文字、图片的基础，综合运用三维、虚拟现实技术等手段将传统的技艺、经验等以图文影音并茂、虚拟仿真的效果展示出来；交互功能方面，资源信息系统的设计要凸显交互性，方便民众切身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事业中来；个性化功能方面，可根据受众身份（研究人员、管理人员、项目传承人、普通民众等）的不同设置相应的资源数据库使用权限，以便提供针对性的信息和服务。此外，可通过提高合作程度来改善我国“非遗”资源分布及建设情况不均衡的现状。在资源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可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原则的指导下，由我国政府主导，引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文化管理部门、图书馆、档案馆、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进行广泛的合作，协同合作，进一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

和研究工作。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意义

4.1 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

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方法具有封闭、分散等劣势，主要是以民族、群体甚至个人的记忆为载体进行存储。这种保存方式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受到“非遗”传承人个人认知理解程度及记忆规律的限制，可能会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的失真；另一方面，受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影响，特别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当代部分青年对民族民间文化缺乏保护意识及使命感，可能引发由于缺乏文化继承者而造成民族文化断层的局面。当代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最保真的形式长久地保存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其一，数字化传播具有准确性与可集成性。首先，准确性是数字记录的重要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必须基于其保存的准确性。数字化技术通过纪实性记录，以文本、图片、声音、音像、动画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经验等进行全方位的最真实记录，满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保存准确性的要求。其次，可集成性是数字化的另一重要特征。由于数字储存器具有巨大的储存能力，能将大量的文本、图片、声音、影像等数据和信息储存于微型芯片上并实现信息之间的有机整合，便于文化遗产资源的保存。

其二，数字化传播具有可拷贝性和永久性。首先，数字化数据具有可拷贝性，这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和传播带来了低成本、高效率、准确逼真等传播优势，确保了保存和传播的信息与第一手资料的一致性。其次，可拷贝性也有利于“非遗”资源的永久性保存。拷贝备份防止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因为个别影像材料的丢失而造成的信息不完整，使“非遗”资源的永久性保存成为可能。

4.2 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将数字化传播技术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传统的封闭式、单一化、低效率的群体传播开始转向开放式、多样化、高效率的大众传播。

其一，数字化传播具有真实性和直观性。数字化传播运用文字、图片、声音、影像、动画等数字媒体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图、文、声、像信息以数字形式存入数据库中，从而真实、直观、系统、全面地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数字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性和直观性，防止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失真与过于抽象化的弊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艺术特征、技术特征、表现手法、唱腔、动作等传播内容更为准确、全面、具体与生动。

其二，数字化传播具有即时性和交互性。即时性与交互性是数字媒介的重要特征，也是数字媒介带给人们最直观的感受。数字化传播利用信息传播即时性、交互性、无界化及聚合性等特性，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地交流和广泛传播。数字化传播整合了资源，以多元化信息的传递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新模式。

4.3 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转化

知识转化（knowledge conversion）是指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变化。日本知识管理专家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提出知识的转化要通过“Socialization（社会化 / 群化：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Externalization（外化：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Combination（综合化 / 融合：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Internalization（内化：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四个过程来完成，简称 SECI（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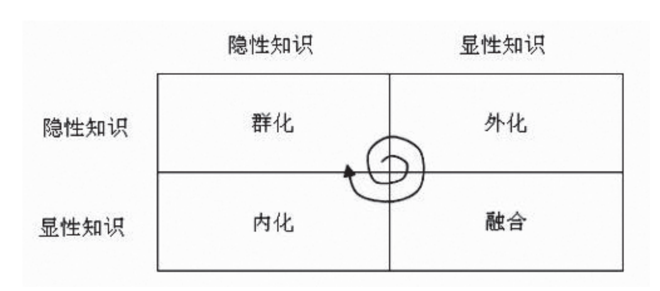


图 1 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转化关系

表 1 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转化结果

	隐性知识	显性知识
隐性知识	社会化（意会知识）	外化（概念化知识）
显性知识	内化（操作化知识）	综合化（系统知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包含“能被明确表达”的显性知识和“不能通过语言、文字、图表或符号明确表述”的隐性知识，两者之间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且可相互转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如不可再生性、脆弱性、活态性、传承性等，加大了其蕴含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相互转化的难度。借助数字化技术，如网络技术、影像技术、虚拟技术、数据库技术等，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社会化的过程中，传统上主要通过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等形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隐性知识得以传递。其中，师传徒受就是个人间分享隐性知识的典型形式。借助数字化技术建立虚拟知识社区，则为在更广范围内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创造了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外化，主要是为了将非物质文化遗憾蕴含的隐性知识转化为受众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传统的转化方法包括类比、隐喻、假设等。当前数字化技术下知识挖掘系统、专家智能系统的开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提供了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综合化是一种知识扩散的过程。传统的方法是将零碎的显性知识进行整合并用专业语言表述出来，形成知识系统。当前数字化文档管理、内容管理、 数据仓库等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显性知识系

统化的有效工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内化过程，是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显性知识转化为各传承人的隐性知识。也就是说，知识在各传承人间传播，传承人接收了这些新知识后，可以将其用到实际“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中去，并创造出新的隐性知识。传统的“非遗”知识内化方法包括团体工作、工作中培训等。数字化技术下的协作工具，如电子社区、E- learning 系统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内化提供了有效的手段。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转化，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双向传播，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时代的保护和传承。

5. 结语

信息化时代，数字技术凭借其显著的传播优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方面的价值，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我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然而，在全球化、现代化及经济一体化的挤压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保护和传承的重大挑战。如何用数字化技术保护中华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之根，是时代赋予国人的责任和使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学校“非遗”教育、资源数据库建设等数字出版传播模式，能有效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化时代的保护、传承与知识转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际应用价值。媒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 公约与建议书 [EB/OL]. http：//en.unesco.org.

[2] 星野昭吉 . 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 [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96.

[3] 沈启鹏 .“文化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安全 [J].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0（2）：94-96.

[4] 欧阳长莲 . 数字出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J]. 艺术教育，2015（07）：152-153.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

（上接第 83 页）

年中国说》中引用之西谚——“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来解释，今天的出版人不能争当“三岁之翁”，而应该多一些“百岁之童”，多一些进取之心，少一些暮气沉沉，用积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打造出更多的出版精品。

3. 2 高素质的编辑队伍

由于新型数字出版内容更为多元化而且具备相当的拓展性，所以需要编辑拥有更加开放的发散思维，掌握更加丰富的专业知识。尤其在学术出版方面，大量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和借鉴形成了诸多的边缘交叉学科，学术研究也在向多元化发展，学术著作在探究相关学科深度的同时，也要用更加广阔的视野来观察相关学科的前沿理论，判断其能否与本学科相关联产生新的“化学反应”。

对于出版工作而言，作者常常把重点放在挖掘知识深度上，著作往往注重立论；而编辑除了注重立论本身，还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立论过程中所提及的知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上，在提升著作的广度上多下功夫。不仅如此，编辑工作还要注重作品内容的展现形式，这就需要编辑熟练运用一些新技术手段或对其有相当的了解才能达到新型数字出版工作的要求。

在过去，编辑工作与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的关联性不高，好像相关技术与图书出版工作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甚至认为与这些领域是“隔行如隔山”。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过去出版行业难以突破的一些瓶颈是可以依靠这些新技术解决的，而且可以将著作内容更为直观、生动和立体地表现出来。例如，一项新技术的学术著作中，在相关段落结尾插入一个二维码，用户通过“扫一扫”就可以观看到短片，几分钟的视频和解说词就可以帮助用户直观、准确地理解前文所提到的知识，这一过程想必要比冥思苦想的感觉畅快很多，也可以大幅度地提高效率。而这个短片的脚本写作、媒介技术的运用，需要编辑在准确把握作品内容的前提下，运用新技术手段来实现，这在未来的编辑工作中会越来越常见。并且，当这些素材积少成多后，如何统筹管理和熟练运用也将成为编辑的工作重点之一。

4. 总结

梁启超曾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对于出版业的从业者来说，在新的市场环境下，站在更高的视角，以广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务实的作风与专业的素养面对汹涌澎湃的大潮带来的冲击，失去的只有枷锁，而得到的一定是更多的出版精品和更丰富的产品形态。媒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